

·教育与新质生产力·

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的优势、风险及其纾解

韦 勋, 邹 新

(重庆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54)

摘 要:在信息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领域将进一步激发自身的应用潜力并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有利于“创新教育模式,适应教育前景”“改良学习工具,提升学习质量”“整合教育内容,提高教学效率”。然而 ChatGPT 存在治理缺失、规范缺位、定位不清等缺陷,容易使高等教育产生信任风险、安全风险、伦理风险和价值风险。因此,需要正确把握传统教育与智慧教育的关系、建立健全治理机制、赋予 ChatGPT “中间人”身份、增强人工智能监管力度,从而纾解相关风险,实现 ChatGPT 对高等教育的正向赋能。

关键词:ChatGPT;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现代教育技术;伦理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48(2024)03-0017-06

Advantages, Risks and Mitigation of ChatGPT Interventiing in Higher Education

WEI Xun,ZOU Xin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prospects, and ChatGPT's interven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will further stimulate its application potential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innovating education mode and adapting to the prospect of education", "improving learning tools and quality", and "integrating education content and improving teaching efficiency".However, ChatGPT has defects such as lack of governance and norms and owning unclear positioning, which is likely to trigger risks in trust, security, ethic and value in higher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intelligent education, to establish a sound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give ChatGPT the status of "intermediary", and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 as to mitigate relevant risks and realize the positive empowerment of ChatGPT for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ChatGP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gher education;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thic

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 OpenAI 公司推出最新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 以来,它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其鲜明的特征和优势而受到高校师生的青睐,他们可以将其用作课程设计、课程学习、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对此有学者指出:

“ChatGPT 的到来将成为高等教育加速的引擎。”^[1]与此同时,ChatGPT 作为一种新型人工智能,将其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也将带来诸多不良影响。有学者简明扼要地指出其存在的三个问题:1.“ChatGPT 致‘广大’而不能尽‘精微’”;2.“有知

收稿日期:2024-02-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公共讨论中理性的生成路径与培育机制研究”(18YJC710111);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专题式教学改革与实践”(2017yjc213);重庆理工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自主·学习·分享’理念的思政课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为例(2018YB31);重庆理工大学一对一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经济类专业“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耦合联动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研究(0120239086)。

作者简介:韦 勋(1998-),男,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邹 新(1978-),男,博士,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识,但缺智能、缺智慧”;3.“对现有考试评价制度也会造成冲击,导致严重的知识产权和学术诚信问题。”^[2]由此可见,ChatGPT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重大挑战,需要我们充分审视其优劣,探寻正确的使用态度和方法。因此,本文不仅分析 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产生的优势,还重点分析其引发的多重风险,并以多维视角探索其纾解之道。

一、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的优势

ChatGPT 作为当前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在其介入高等教育领域的过程中产生了可观的正面效益,促使高等教育在模式、工具、内容、思维等方面进行颠覆性创新。

(一)创新教育模式,适应教育前景

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技术的介入,以往那种“手把手”的教学模式已然受到“现代教育技术”的冲击。当前,随着 ChatGPT 的横空出世,现代教育技术进一步得到改进,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应该与时俱进。一方面,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进一步创新了“智慧教育”模式。智慧教育是指以计算机为载体、信息技术为应用且区别于传统教育的新模式,可以说,信息技术的水平高低决定了“智慧教育”模式的效能。作为当前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 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从本质上创新了“智慧教育”模式,实现了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工具的迭代,进而提升了教学效率。另一方面,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有利于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就当前社会结构和就业形势而言,传统的单一学科建设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对复合型和创新性人才的需求,亟需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而 ChatGPT 则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ChatGPT 以其数据规模庞大、语言系统完善等优势在各学科融汇交流的过程中充当了“桥梁”作用,引导各学科之间资源、方法、内容的共建共享,通过数据无形的特点打破了一级学科之间的有形壁垒。

(二)改良学习工具,提升学习质量

技术裹挟着网络的发展使高等教育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各类现代学习工具层出不穷,为高校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便利。事实上,作为青年学生,他们已经具备熟练运用各类学习工具的能力,但是当前的学习工具仍然较为单一,大多是面向某一个学科的“专门工具”或“偏重于对学习过程中某一方面的支持”。^[7]在此情形下,ChatGPT 以其普遍性价值而受到青年学生的青睐,并显著提高了学习质量。一是改良了学习方式,譬如有学者提出

“ChatGPT 可以采用‘苏格拉底教学法’,通过讨论、问答甚至辩论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学习,而且 ChatGPT 可以随时随地给予学生必要的反馈和帮助。”^[8]通过这一方式既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上合理使用智能设备从而配合完成相应课程任务;又可以使学生将课程学习迁移到课堂外从而提升自主学习质量。二是促进了知识积累,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将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是静态的概念、原则理论等,而程序性知识则是动态的动作技能、认知技能、认知策略等。以往的人工智能学习工具更多强调对陈述性知识的储存和传播,学生主要是被动的接受知识灌输,而 ChatGPT 同时还强调对知识架构的分析、完善和创新,学生使用 ChatGPT 学习工具既能够提高对陈述性知识的积累,又能够加深对程序性知识的理解,由此实现“动”与“静”的结合,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三)整合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

教育始终以“教什么”即教学内容作为中心任务,“这些内容最终以课程体现出来。”^[9] ChatGPT 围绕课程展开的全过程、全方位进行驱动与赋能,从而充分整合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从宏观上看,ChatGPT 的运用有利于优化课程设计。课程设计通常需要考虑课程目标、课程定位、学生情况等要素,ChatGPT 通过对学科动态信息、教育政策、网上学习数据等教育信息的整合,形成庞大的教育信息数据库,并进一步归纳出当前学科课程的教育目标、学生的学习偏好、课程发展的现状,从而生成适应教育前沿和政策要求的课程设计。改变了过去仅依靠教师个人经验而展开的单向性课程设计模式,在归纳分析教育教学大数据的前提下形成以目标、现状、手段、前景为基点的多线并进式课程设计。从微观上看,ChatGPT 的运用有利于整合课程内容。传统高等教育对课程内容的选取强调“囊括”,也就是将涉及某一学科的所有相关内容一概包揽,核心资源与边缘资源共存,结果造成课程内容冗杂、教育资源浪费等不良现象。而 ChatGPT 则强调“精选”,它可以根据使用者的指示有效筛选出符合课程要求的内容,真正做到“整合”而非“搜集”。此外,普通人工智能更倾向于保存过去的信息数据,因此许多陈旧的课程内容仍然呈现于高等教育课堂当中,已然失去了“时效性”。ChatGPT 则兼顾当前最新信息数据,做到课程内容“实时有更新”,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课程内容上的滞后性和封闭性。

二、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的风险

尽管 ChatGPT 能给高等教育带来极强的正面效益,但究其根本它仍然只是人工智能而非真正的“大脑机能”,因此还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并由此给高等教育带来一定的风险挑战。

(一)信任风险

ChatGPT 以其数据的丰富性、功能的全面性、模式的创新型受到高等教育从业者的追捧,甚至于盲目追捧;同时,由于 ChatGPT 存在虚拟性、不确定性等特质而导致人们对其心存疑虑和担忧。由此高等教育从业者对 ChatGPT 的认知存在“过度信任”和“不信任”这两种极端。其一,ChatGPT 的本质是一种大型语言模拟系统,它可以模拟并构建与人类的对话,做到“有问必应,有题必答”,正是这种数据反馈较为及时、针对性较强的特征使得部分高校教师和学生对其产生依赖,即使他们知道 ChatGPT 的数据来源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他们在面临课程设计、课程作业的迫切需要时仍然选择利用这种“方便”“快捷”的答案。长此以往,ChatGPT 则会成为高校师生完成工作和学业的首要选择,而这种显著的效益使得高校师生主动或被动地产生“信任感”,以至于 ChatGPT 的诸多劣势被这种“过度信任”所掩盖。其二,ChatGPT 存在数据来源难以保障、语言逻辑失真的缺陷,“ChatGPT 所给出的可能并不总是符合人类期望的结果,甚至由于会虚构不存在或错误的事实,所输出的内容可能出现答案符合语言逻辑但不符合事实或不准确的情况。”^[10]在面临一些复杂问题时,尽管它能够尽可能迎合使用者,并给出相应问题的回复,但是这种回复往往只是符合表层语言而违背深层逻辑,对使用者来说依旧存在“欺骗性”,一旦大量使用者意识到此问题将会大大降低 ChatGPT 的可信度,甚至进一步使高等教育从业者对 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产生抵触心理。此外,ChatGPT 的功能存在本质缺陷,作为中立性的人工智能容易被使用者错误操纵,众多师生利用 ChatGPT 撰写课程论文、学术论文,不仅使论文失去了应有的创造力,而且对学术诚信带来重大挑战。

(二)安全风险

数据、网络、信息技术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要素,然而这些存在于虚拟空间的要素恰好是引发安全隐患的诱因。作为新生事物,由于缺乏数据审查和保护机制,ChatGPT 很容易僭越规则制度,从而产生安全风险。第一,个人隐私安全。高校师生的个人信息较为敏感和复杂,因此对高校师生

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是应有之义,然而 ChatGPT 的介入却给个人信息安全带来威胁。ChatGPT 在教学应用、信息搜集、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会通过网络的漏洞接触到他人的隐私数据,并且在反馈信息、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将个人隐私泄露。因此“在高等教育应用中,教师和学生普遍担心使用 ChatGPT 等大型语言模型可能对他们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造成威胁,包括对数据泄露、未经授权访问学生数据以及将学生数据用于教育以外的目的的担忧。”^[11]除此之外,隐私安全风险还随着 ChatGPT 的产品化、具象化而放大,有学者认为“若未来实现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必将涌现大量有商业价值和低使用门槛的 ChatGPT 类智能产品,学习者的隐私和信息安全保护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12]第二,知识产权安全。高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知识的产权也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当前 ChatGPT 以其虚拟性、非正式性而频繁打破知识产权的底线。从信息来源而言,ChatGPT 的本质仍是对各类信息的“归纳”而并不是“创造”,也就是说它将大量已具有产权的知识进行重组最后形成“新知识”,实际上这种“新知识”已经涉及到知识产权,一旦将其以任何方式翻译、出版、发行时则会发生侵权行为。从使用者角度而言,ChatGPT 只是一种智能工具,它并不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只会无条件的满足使用者的相关需求,哪怕其行为已经侵犯了知识产权而不自知。目前高校师生对于科研的需求日益增强,他们将 ChatGPT 用于科研用途的频率较高,如果操作不当将会导致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伦理风险

“应用”的前提是“掌握”,然而当前我们对 ChatGPT 这种新型人工智能工具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对其角色定位还不够清楚,对 ChatGPT 与人的关系还未充分厘清,由此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在技术层面上,可能导致“数字伦理”风险。其一,“ChatGPT 给出回答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技术黑箱’,具有不透明性和不可解释性。”^[13]因此容易生成一些无法追溯的不透明数据,这些不透明的数据中极有可能存在一些对高等教育有害的信息因为无法突破“技术黑箱”而难以被识别。如果长期缺乏治理将会导致这一现象被用户所默认,以至于高等教育受到不良信息的持久威胁。其二,ChatGPT 的对话模型存在缺陷,通常我们在提出一些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时会被自动判定为“无可奉告”,但是只要我们转变提问方式,将直接询

问某事改为分析某事的原因、后果以及手段时,系统往往会对我们“倾囊相授”。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缺陷将会很容易被学生“钻空子”,轻则助长学术不端等行为,重则引诱学生突破法律底线。在主体层面上,可能导致“主体伦理”风险。其一,对于高校学生而言,ChatGPT 所覆盖的领域更加全面、反馈的效率更加高效,他们习惯于运用 ChatGPT 来辅助完成课程任务,在尽量避免知识建构的前提下获取完成学习任务的“成就感”。事实上“在知识建构的过程,大脑的神经元细胞需要不断处理信息,这一过程能够帮助大脑发育,而随手可得的答案将迎合大脑的‘走捷径’特征,贪恋多巴胺,最终阻碍发育。”^[13]可见高校学生如果对 ChatGPT 形成依赖就会逐渐丧失批判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大脑机能就会不断被“人工智能”所部分替代,学生的自主“学习”将蜕变为人工智能的替代“学习”,这时我们将面临“ChatGPT 和学生谁才是真正主体?”的问题。其二,在传统高等教育模式下,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工具的交互关系较为明确,但 ChatGPT 的介入则会打破这种平衡关系。ChatGPT 的知识储备远超任何高校教师,在此情况下学生甚至对 ChatGPT 的教育能力更为肯定,教师反而异化为辅助其工作的工具,这时候我们又会面临“ChatGPT 和教师谁才是真正主体?”的问题。

(四)价值风险

ChatGPT 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只要坚守正确的价值理念和理性思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用户。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ChatGPT 并没有过多关注公共性的治理,从而导致用户价值伦理的失范。高等教育阶段是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如果公共领域长期缺乏有效治理,青年学生将会受到不良价值观的茶毒。其一,价值风险表现为公共秩序威胁。ChatGPT 作为公共性人工智能产品,我们需要考虑到使用这种新型工具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影响,这就要求使用者本身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同时人工智能的使用也需要符合社会规范。然而,ChatGPT 却难以保证信息规范,甚至还会制造一些信息假象,“信息假象的深度伪造技术会造成个体理解和社会认知的迷惑,久而久之将丧失对真理的追求和价值体系的紊乱。”^[14]青年学生极易被这种假象所迷惑,逐渐丧失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不仅无法维护社会公正,而且还可能成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者。其二,价值风险表现为意识形态霸权。OpenAI 将

ChatGPT 标榜为一种中立性工具,诚然,意识形态的传播是以人为主体的而非工具,但是“ChatGPT 是政治价值文本喂养与政治附庸者设计的算法模型,其自始受政治偏见的喂养,具有明显的政治价值偏见。”^[15]由此可见,ChatGPT 并不具备在真正的价值中立性,设计者早已在算法中暗中嵌入了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算法追求的是具有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高校学生在使用 ChatGPT 时往往在不经意间便陷入这种意识形态的陷阱,导致高校学生受到西方政治价值偏见的误导。同时,ChatGPT 还通过对各国高等教育关键信息、前沿信息的整合进而分析出相关的政治舆情、高等教育模式、学生学习倾向,以此改进算法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和传播方式,从而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持续受到潜在的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威胁。

三、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的风险纾解

面对 ChatGPT 本身的缺陷以及介入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多重风险,我们需要以多维视角审视多元问题,并有针对性地予以纾解,实现 ChatGPT 对高等教育的正向赋能。

(一)教育之维:把握传统教育与智慧教育的关系

ChatGPT 引发信任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的本质缺陷——虚拟性。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高等教育的教育目的与中小学教育存在本质上的差别,除了强调理论教育之外,更注重通过实践教育促使高校学生打牢专业基础、获取专业技能。因此需要重视教育的现实场景,要在贴合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的前提下拓展 ChatGPT 的应用功能,从而走出虚拟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要正确把握传统教育与智慧教育的关系。首先,传统教育是智慧教育的基础。课堂、教师和课本是传统教育的重要要素,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介入高等教育实质上是对这些教育要素进行赋能。因此,我们推行智慧教育模式首先要对教学的基础要素进行巩固,保证高等教育的基础框架不偏离,从而提高高校师生对传统教育要素的关注和信任,使得他们在面对 ChatGPT 生成的虚拟数据时也能够保持清醒认知,有选择性的选取关键、无误的信息。同时,高等教育并非是单一的知识传播活动,而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作为首要目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工程,所以我们要拒斥利用 ChatGPT 直接获取答案的行为,要通过激发高校师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消除高校师生对人工智

能的盲目自信和过度依赖。其次,智慧教育是传统教育的创新和拓展。虽然我们极力反对过度信任人工智能的行为,但是作为 OpenAI 所开发的最新成果的 ChatGPT 也是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一大机遇,需要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将其介入高等教育,实现智慧教育模式的更新迭代。一方面,高校要充分重视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探索 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的正确途径,实现传统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变。另一方面,高校要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要培养教师队伍的创新思维和科技思维,增强其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和手段。同时,高校应当适时完善和更新智能设备,提高数据产出能力,为 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在此基础上形成以 ChatGPT 为手段的智慧教育新模式、新平台。

(二)制度之维:建立健全治理机制

如上文所述,ChatGPT 的应用伴随着泄露个人隐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发生,由此产生安全隐患,而高等教育领域的信息和产权通常更为私密,甚至涉及国家安全。因此,高校对于安全保障的需求十分迫切。首先,要建立健全预防机制。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当始终以维护高等教育相关者的切身利益为目的加强监管。例如有学者建议“监管方应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严格的法律政策,以及专门的监督机构,来确保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在投入教育市场应用之前、之中和之后全过程的安全、诚信和高效。”^[16]以法律法规的强制性促使开发者、使用者正确把握 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的路径,做到“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注重风险预测,提前预设 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进程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尤其要针对可能产生数据泄露和侵权的行为专门立法、专项立规。同时,加强宣传,促使使用者提高警惕并逐步树立起风险防控意识,增强对个人隐私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对知识产权的承认和保护力度,做到“未雨绸缪”。其次,建立健全惩戒机制。对于各类侵权行为如果不加以惩罚或者惩罚力度不够,将会放大 ChatGPT 的内部缺陷和外部威胁,导致 ChatGPT 对高等教育“反向赋能”。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构建起完善的惩戒机制。对开发者而言,以 ChatGPT 衍生出的教学工具必须尽量规避无授权的信息搜集行为,如果相关软件、工具产生了侵权行为,应当被禁止继续开发和使用;对使用者而言,在运用 ChatGPT 的过程中应该尊重他人隐私和知识产权,如果产生学术造假、学术抄袭、

倒卖隐私数据等行为,不仅要限制或取消其访问权限而且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对社会组织而言,应该对 ChatGPT 产生的数据加以辨析,如有涉嫌侵权应该及时停止访问,如果利用 ChatGPT 的侵权行为而获取不当商业利益,相关部门需要及时追回非法利益并予以处罚。

(三)主体之维:赋予 ChatGPT“中间人”身份

ChatGPT 仅仅是一种新型人工智能工具,然而部分高校师生由于缺乏技术理性和急功近利的心理作祟而将其地位提升到本不应该的位置,导致部分高校师生将主体性主动让度给 ChatGPT,从而导致主体意识缺失和主体人格异化。在此情形下,只有赋予 ChatGPT“中间人”身份才能重新明确高校师生的主体身份。第一,充当教师与学生的“中间人”。人工智能的介入打破了师生之间的传统关系,以往师生“面对面”直接沟通的形式一定程度上被间接沟通所替代,教师习惯于通过 ChatGPT 总结学生的学习情况,而学生习惯于以 ChatGPT 分析教师的教学意图,由此拉大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应该强调 ChatGPT 在师生之间扮演的“中间人”身份,将其作为师生交往之间的“中点”而非“终点”。以此强化教师教学的主体地位、学生受教育的主体地位,强化教师的权威,防止 ChatGPT 的过度参与,最终实现师生交往的可行性、稳定性、普遍性。第二,充当教师与教学的“中间人”。教学活动是一个系统性工作,ChatGPT 充其量在教师教学中起到“出谋划策”的功用,而不是直接行使教师的各项职权,例如教师在运用 ChatGPT 生成教案、分析学情、设计考试的时候要充分意识到“ChatGPT 的建议只能作为专家决策的辅助工具。”^[14]教师应当牢固树立主体性意识,明确 ChatGPT 在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与教学反思中的辅助地位,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主动施以人工干预,达到以自我能动性驱动 ChatGPT 功能性的目的。第三,充当学生与知识的“中间人”。尽管 ChatGPT 已经能够促进学习者接收“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但仍然需要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因为思想须借助文字的翅膀而飞升,即使是最抽象的文字,例如意象,最后也会和身体的动作有关”。^[17]可见学生运用 ChatGPT 获取知识也只是得到了“抽象的文字或思想而已”——这仍然属于“知”的范畴,而高等教育强调培育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高校学生要将学习重心置于“实践”,通过“行”理解“知”,其中 ChatGPT 则是辅助学生连接知与行的关键“中间

人”。此外,高等教育还强调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然而 ChatGPT 给出的知识通常仅仅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广泛的“正确答案”,“一定程度在磨灭可能出现的突发奇想和深思熟虑。”^[18]因此我们还需要明确一点:ChatGPT 只能作为“归纳知识”的“中间人”,而不能作为“创新思维”的“中间人”。

(四)价值之维:增强人工智能监管力度

面对 ChatGPT 本身存在的政治价值偏向,高等教育如何保证正确的价值方向,从而培养出有担当、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人才队伍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课题。基于技术维度,ChatGPT 因为其强大的数据搜集和产出能力,使得生成的数据内容较为庞杂,高校使用者难以辨别并选取符合当前政治价值的信息;又因为其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得 ChatGPT 容易脱离预设的政治价值轨道,破坏了高等教育运用人工智能增强效益的路径。这时候我们需要通过嵌入有力的筛查程序或接口对生成的数据进行初步过滤,保证数据符合当前的意识形态要求。有学者认为,“ChatGPT 运用 Moderation API(审查接口)持续判断用户请求是否符合内容政策,并警告或者阻止某些类型的不安全内容,从而减少响应有害指令或者表现出有偏见的行为。”^[19]通过这种审查接口可以在意识形态边界建立起“围墙”,一定程度上实现“在整合不同信息的过程中,彰显技术价值,顺应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做好思想引领工作。”^[20]从而通过技术手段对算法进行约束,防止青年学生接触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各类诱导信息。基于主体维度,破解价值陷阱的关键之处实际上还是在于主体自身,只有高等教育主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才能使 ChatGPT 保持真正的“中立”,防止其成为放大意识形态风险的催化剂,这就要求高校强化政治教育,为高校师生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一是要加强科技伦理教育。面对潜在的科技伦理风险,国家已经明确指出:“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21]高校应当顺应国家要求,将科技伦理教育的地位提高到显要位置,并将科技伦理教育融入各学科教育当中,促使青年学生提高道德水平、树立技术理性思维,当面对诸如 ChatGPT 一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时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价值判断,做到从“会用”到“用好”的转变。二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内容增强世界观教育,使青年学

生把握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关系,在使用 ChatGPT 时既弘扬科学精神,又坚守“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重要内容增强政治观教育,使青年学生坚持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站位,当面对隐含有不良价值倾向的信息时能够主动“二次过滤”。总之,应对 ChatGPT 产生的价值风险需要从技术和思想两方面把关,用“技术手段”解决价值误导,以“思想武器”突破价值偏向。

四、结语

以人工智能为依托的现代教育技术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因此 ChatGPT 自诞生起就被高等教育领域所关注。诚然 ChatGPT 以其反馈速度快、对话能力强、适用范围广等特点而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但是优势是否能够真正转化为驱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劲动力,还需要仔细斟酌。如果运用得当将会促进高等教育模式的创新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队伍;倘若使用不当,将会使 ChatGPT 成为高校师生逃避学习、学术造假、谋取非法利益的“帮凶”,引发诸多风险。当然,国家已经注意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缺陷,并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正式颁发《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提出了总体性要求。在遵守总体要求的前提下,我们依旧需要注意到 ChatGPT 的虚拟性和不可控性,在其介入高等教育这一场域时还会继续衍生一些新的问题和风险。为预防和应对相关风险,我们需要从技术和主体两个方面同时用功,既要对算法进行规制,也要增强主体的理性思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ChatGPT 还会迭代更新,这也意味着高等教育面临着更多机遇和挑战,推动 ChatGPT 赋能高等教育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 [1] 王洪才,张启富.ChatGPT 将开启高等教育发展加速范式[J].教育发展研究,2023,(11):29-33.
- [2] 本刊编辑部.九位院士、校长谈“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会议综述[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3):1-15.
- [7] 孙洪涛,陈丽,王志军.远程学习工具交互性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7,(04):33-41+80.
- [8] 钟秉林,尚俊杰,王建华,等.ChatGPT 对教育的挑战(笔谈)[J].重庆高教研究,2023,(03):3-25.
- [9] 姜德君主编.教育学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80.
- [10] 王天恩.ChatGPT 的特性、教育意义(下转第 42 页)

- [23] 张晓涛,彭 婷,罗 杰,等.农村初中生公正世界信念、感恩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J].大理大学学报,2022,7(01):99-104.
- [24] 李雪平,李双双.公正世界信念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心理韧性和自尊的链式中介效应[J].中国特殊教育,2016,(03):71-76.
- [25] 李雪平,李双双.贫困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和主观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效应[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6,30(06):464-469.
- [26] Kuang Y, Wang F, Wang Z J.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n's Prosociality: A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Dual Urban-Rural Structure [J].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20, 12(1):63-70.
- [27] 寇 彧,洪慧芳,谭 晨,等.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的修订[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23(01):112-117.
- [28] 程 刚,陈艳红,关雨生,等.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的指标构成及特点[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7(06):156-162.
- [29] 苏志强,张大均,王鑫强.公正世界信念量表的修订及在大学生应用的信效度研究[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2,21(06):561-563.
- [30] 周 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06):942-950.
- [31] Hayes A 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2013, 51(3):335-337.
- [32] Ozili P K. The acceptable R-square in empirical modelling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M]//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publishing results: A guide to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GI global, 2023:134-143.
- [33] Zheng X, Wang Z, Chen H, et al.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21, 49(1):1-8.
- [34] Wills T A. Downward comparison principles in social psychology[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1, 90(2):245-271.
- [35] 郑显亮,谢方威,丁 亮,等.社会阶层与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37(02):182-189.
- [36] Hou Y, Jiang T, Wang Q.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Online Sham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 76:19-25.
- [37] 易 梅,田 园,明 桦,等.公正世界信念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关系:人际信任的解释作用及其性别差异[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9,35(03):282-287.
- [38] 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J].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218-226.
- [39] 温忠麟,谢晋艳,方 杰,等.新世纪 20 年国内假设检验及其关联问题的方法学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22,30(08):1667-1681.

- (上接第 22 页)及其问题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2023,(04):19-25.
- [11] 崔宇红,白帆,张蕊芯.ChatGPT 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风险及应对[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05):16-25.
- [12] 张峰,陈玮.ChatGPT 与高等教育:人工智能如何驱动学习变革[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05):26-33.
- [13] 周洪宇,李宇阳.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与教育治理现代化——兼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07):36-46.
- [14] 李舟,易华勇.ChatGPT 介入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逻辑、风险及应对[J].阅江学刊,2023,(04):67-74+171-172.
- [15] 邹开亮,刘祖兵.ChatGPT 的伦理风险与中国因应制度安排[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04):74-84.
- [16] 姜华,王春秀,杨暑东.生成式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潜能、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J].现代教育管理,2023,(07):66-74.
- [17] [英]佩西·能著.教育原理[M].王承绪,赵端瑛,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10.
- [18] 荀渊.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价值和使命[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07):56-63.
- [19] 谭佐财.ChatGPT 的法律风险与治理路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3):117-125.
- [20] 王英明,汪怀君.象脑与共情:ChatGPT 的伦理风险发微与纠偏[J].理论导刊,2023,(07):108-113.
- [2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3-21(1).